

“犹太名人会议”与犹太教公会重组

——拿破仑的犹太政策

张倩红 贾延宾

摘要: 拿破仑执掌政权后的犹太政策集中体现在召开“犹太名人会议”和恢复重组犹太教公会。他继承并发展了法国大革命赋予法国的犹太人以公民权的优秀成果,但是,在执政期间既限制又利用犹太人。表面上的宽容难以掩盖其复杂的政治动机与经济考虑,法国大革命所弘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与利己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尽管拿破仑的犹太政策充满了矛盾性,但还是为以后百余年间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定下了基调,使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放弃了社团自治,逐步融入所在国家的社会生活。

关键词: 拿破仑 犹太人 犹太名人会议 犹太教公会

拿破仑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是拿破仑对犹太人的政策却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众多的拿破仑传记作家中没有人充分重视犹太人及犹太人问题在拿破仑的生活与政治活动中所占的位置”。¹ 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远远不足,中国学者的研究更是为数寥寥。拿破仑统治是犹太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拿破仑首次提出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政策,发表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宣言,召开了犹太名人会议,实施诸多措施保障犹太人的公民权利,激发了犹太人的民族情绪。拿破仑的军队在横扫欧洲的过程中,推进了犹太人的解放历程,^④ 改变了犹太民族的命运。在以后较长的岁月里,拿破仑的犹太政策一直影响着欧洲犹太社会的精神潮流与价值取向。本文仅拟对拿破仑召开的“犹太名人会议”和“犹太教公会”的恢复和重组作一论述,推进对犹太历史问题研究的深入。

¹ Franz Kobler, *Napoleon and the Jews*, Leo Baeck Institute, Jerusalem: New York and Massada Press Ltd., 1976, p. 7.

^④ “解放”(emancip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emancipatio,原意指古罗马时代儿子摆脱父权而获得独立,后来被引申为个人或团体从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限制中获得自主,尤其指解放奴隶和解放天主教的运动。在犹太史上,对“emancipation”一词的解释不尽相同。从狭义上讲,是指18世纪以来,犹太人作为个体从居住国获得公民权的历史过程;从广义上讲,它意味着犹太人不仅作为个体,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如种族、民族)而获取生存权、发展权及认可权的过程。习惯上认为,犹太解放运动肇始于欧洲。关于解放运动开始的时间,欧洲的历史学家(包括大多数犹太学者)有争议,大部分学者把法国革命作为开端,个别人也以1781—1782年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为开端。参见Hannah Arendt, “Privileged Jews,” in Jacob Katz, ed., *Jewish Emancipation and Self-Emancipation*, New York: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6, p. 76.

一、拿破仑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宣言

18世纪末全世界约有225万犹太人，其中大约175万居住在欧洲。¹法国的犹太人约有4万，^④主要分为两个群体，在波尔多（Bordeaux）、巴约讷（Bayonne）、马赛（Marseille）、阿维尼翁（Avignon）和普罗旺斯（Provence）等南部城市有几千名，其中大多数是15世纪以来涌入的西班牙、葡萄牙的“马兰诺”后裔。^④由于他们长于商业贸易活动，得到当地统治者的宽容，于1729年获得定居权，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与文化，并逐步公开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这部分人被称为“塞法尔迪犹太人”。^¼另一个群体生活在阿尔萨斯（Alsace）、洛林（Lorraine）和梅斯（Metz）等地区，被称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½大约有3万人，仅阿尔萨斯地区就有22500人，^¾他们是17—18世纪随着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对这些地区的征服而成为法国人的。与那些“塞法尔迪犹太人”相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更像是这个国家中的外国人。他们在地理上属于西欧，但在文化上与当地的法国人有很大不同，而更接近于那些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他们主要从事小额贸易、放债业（热衷于高额利息）及充当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中间人，忍受着中欧犹太人所受的种种限制，必须向国王、公爵及各级官员缴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保证其贸易权和居住权。

有必要指出，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而言，法国犹太人的生活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他们基本上可以自由地信仰犹太教。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犹太人的命运。1789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人权宣言》，规定在宗教方面，如果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主张不违背法国的公共秩序，则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⑧此后国民议会通过一系列法令，使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据法国革命的理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那么，就没有理由剥夺本应属于犹太人的权利。同年12月“犹太问题”被提上国民议会的议程，讨论的焦点是应该继续驱逐犹太人，还是赋予他们公民权。在米拉博和阿贝·格雷高利的大声呼吁下，经过激烈争论，进步势

¹ John Merriman,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1,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Age of Napole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p. 412.

^④ Howard Morley Sachar,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7, p. 53.

^④ “马兰诺”，亦称“马兰内”即 marrano 的译音，是中世纪前期西班牙语中的一个词汇，含义为“猪”。西班牙人把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蔑称为“马兰诺”。

^¼ “Sepharad”是希伯来语中对西班牙的称谓，最早出现在希伯来语《圣经》中，所以人们把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称为“塞法尔迪人”（Sepharadim），把他们的文化统称为塞法尔迪文化。塞法尔迪犹太人在被驱逐出西班牙、葡萄牙后，散居在欧洲的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异，生活在土耳其和西亚、北非等地的塞法尔迪犹太社团与东方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是，他们一直为其祖先在15世纪以前所创造的辉煌文化而陶醉，极力强调其独特性。参见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Judaism/Sephardim.html>.

^½ “Ashkenazim”的译音，最早出现在14世纪的文献中，是对居住在日耳曼地区的犹太人的称谓，具体来说，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特指在法国北部、德国和斯拉夫地区形成的犹太文化共同体。参见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Judaism/Ashkenazim.html>.

^¾ Esther Benbassa, *The Jews of France: A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4.

^⑧ George Rude, *Revolutionary Europe 1783-1815*,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p. 107.

力获胜。1790年1月28日，法国南部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和阿威尼翁教皇领地的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但占法国犹太人大多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并没得到公民权。¹此后，德波裔犹太人积极提出公民权申诉，在国民议会的辩论中，罗伯斯庇尔坚持认为如果否认犹太人为法国公民，那么贯彻“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精神则是不可能的。^④在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成员及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多方努力下，国民议会最终在1791年9月27日通过决定：废除以前的法律条文中对犹太人的限制、束缚及驱逐，感化作为个体的犹太人，使其作为公民宣誓效忠。^(四)据此，法国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其权利有了法律的保障。法国犹太人的解放是与法国大革命及其原则紧密相连的，没有革命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及特权阶层的瓦解，就不会有犹太人的解放。尽管雅各宾派当政时期的“恐怖政策”和激进的反宗教运动使犹太教活动不得不转入秘密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法国犹太人的解放进程，但大革命原则的存在仍使犹太人的状况得到某些改善。^{1/4}

18世纪末发生在欧洲的“哈斯卡拉”运动是犹太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1/2}虽然影响的范围多局限于知识分子及社会上层，但对犹太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因素为拿破仑的犹太政策提供了前提和广阔的政治空间。必须明确的是，就当时的社会实际而言，大部分犹太人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仍被隔绝于欧洲主流社会之外。

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岛上没有犹太社区。少年时期，他对犹太人的了解是通过阅读《圣经》而得到的。他把《圣经》看做是“上帝的语言”，把以色列人看作“上帝的人民”。拿破仑第一次接触犹太人，是在他作为法军总司令率兵远征意大利期间（1796—1797）。意大利的犹太隔都是欧洲地区最早、也是最典型的犹太隔都。^{3/4}许多世纪以来，“血祭诽谤”的流传、^⑤暴民的攻击以及强迫改宗的压力等使当地的隔都成了犹太人的地狱。随着法国军队的进入，犹太人终于去掉了佩戴在衣服上的黄色大卫星，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事情。^(七)1797年2月，拿破仑率军进入安科纳（Ancona）时，看到犹太人居住的狭小隔都，当即下令捣毁，又颁布法

¹ Samuel F. Scott & Barry Rothaus, ed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5, p. 507.

^④ Ilana Shamir & Shlomo Shavit, eds., *Encyclopedia of Jewish History: Events and Eras of the Jewish People*, Ramat Gan: Massada Publishers, 1986, p. 99.

^(四) Esther Benbassa, *The Jews of France: A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pp. 81-82.

^{1/4} 倪华强：《法国大革命与法国犹太人的解放》，《史林》1992年第1期，第78页。

^{1/2} “哈斯卡拉”为希伯来语 Haskalah 的音译，意为“启蒙”（enlightenment）。哈斯卡拉运动即犹太启蒙运动，指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中欧及东欧犹太人中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

^{3/4} “隔都”（Ghetto）指城镇中专门为犹太人划定的居住区。一般说来，隔都的四周有围墙，只留一个或几个供出入的大铁门，被严格把守，夜晚要拴上门，安息日或犹太圣日也要关闭。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通过一项法令，命令犹太人住进威尼斯的一个特别居区，这个犹太人区被称为 Ghetto。后来 Ghetto 一词被广泛应用到欧洲各地，许多城市都有了犹太隔都。一般认为，Ghetto 一词来源于希伯来语的 ghet，意为“分开”或者“脱离”（divorce or separation）；也有人认为它来自希腊语、德语或意大利语。法国革命后，随着犹太人的解放，隔都的高墙被相继拆除了。参见 Mordecai Schreiber, eds., *Jewish Encyclopaedia*, vol. 1, New York: Shengold Books, 1988, pp. 92-93; C. Roth and G. Wigoder, eds., *Encyclopaedia Judaica*, vol. 7,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Jerusalem Ltd., 1971, pp. 542-543.

^⑤ 指 blood libel，是中世纪流传于欧洲的对犹太人的一项无端指责，诬陷犹太人在逾越节或其他犹太人节日杀害非犹太人，尤其是以基督徒儿童充当祭品。

^(七) Solomon Grayzel, *A History of the Jews: From the Babylonian Exile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⑦,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8, p. 574.

令规定犹太人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区域。随后，拿破仑在意大利相继关闭了韦罗纳（Verona）、帕杜阿（Padua）等地的犹太隔都，并捣毁了当地的宗教裁判所。同年7月，威尼斯（Venice）隔都的大门也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焚毁。意大利的犹太人把拿破仑当作他们的拯救者来欢迎。

在意大利的经历给拿破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了解到犹太人最渴望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同时，“意大利战役与犹太人的相遇，为此后在埃及与巴勒斯坦的远征奠定了政策框架，拿破仑在意大利所学到的东西在非洲和亚洲又得以应用”。¹ 1798年5月，拿破仑以“科学院院士、东方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领陆军、水兵以及科学家远征埃及和巴勒斯坦。在行军途中，拿破仑解放了他所占领的英属马耳他岛（Malta）上的犹太人，并允许犹太人建立会堂。^④ 同时，拿破仑还把解放犹太人的政策带到了埃及：给予埃及犹太人宗教平等权，准许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埃及成为欧洲大陆之外犹太人第一次获得平等权利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1798年9月7日，拿破仑任命两名埃及犹太人担任“犹太民族”的高级祭司，这是拿破仑在处理犹太人问题时第一次用到“犹太民族”这个概念，同年12月19日，拿破仑在参观位于西奈半岛上的一座著名希腊天主教教堂时再次提及。此后不久，他还精心挑选一支专业队伍去西奈半岛探寻摩西留下的遗迹，但随着军事形势的紧张和征服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启动，探险活动很快终止，这段探险经历被认为是拿破仑东征过程中一段小小的插曲。^④

1799年2月起，拿破仑率领13000名士兵开始征服巴勒斯坦，在越过西奈半岛占领了艾尔阿里什（El Arish）、加沙（Gaza）、希伯伦（Hebron）、拉马拉（Ramleh）、雅法（Jaffa）后，又北征海法（Haifa）、阿卡（Acre），但在进攻阿卡要塞的战役中法军严重受挫，于6月1日返回埃及。^{1/4} 在征战巴勒斯坦的过程中，为争取当地犹太人和世界各地犹太社团的支持，拿破仑于1799年4月20日，也就是犹太人的传统节日——逾越节的第一天，发布了一项政治宣言，即“法兰西共和国驻亚洲非洲总司令波拿巴将军致巴勒斯坦后裔书”，^{1/2} 号召亚洲和非洲犹太人与他一起恢复耶路撒冷往昔的辉煌，并承诺给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现在就向全世界宣布：你们要收回被夺去千年的公民权，要在政治上自立于民族之林，要获得依据信念去崇拜耶和华的无限自然权利，而这些权利无需掩饰，且可能永存世间。”

这一宣言在巴勒斯坦地区引起了震动。一部分犹太人乐观地认为，拿破仑会使他们回归祖先之地，并为他们重建所罗门圣殿，他们甚至把拿破仑与“弥赛亚”相提并论，^{3/4} 从而引起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极大恐慌。宣言在欧洲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建立民族家园的计划随着拿破仑远征的失败很快流产了。

那么，拿破仑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宣言？这是长期以来犹太史学家乐于品味的问题。有人认为，拿破仑的所作所为，纯粹是想“获得犹太人保护者的身份，进而占据巴勒斯坦”，“拿破仑的宣言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已，其目的是想获得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支持”。^⑧ 也有学者强调拿破仑宣言虽然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心是不容置疑的。这一倾向的内在动因在于他的“东方文化情结”。有许多事实证明，拿破仑本人对古埃及、古希伯来人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感，对他们创造的文明具有崇敬之情。

¹ ④④ Franz Kobler, *Napoleon and the Jews*, pp. 20, 34, 38 40.

^{1/4} ^{1/2} C. Roth and G. Wigoder, eds.,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 12,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Jerusalem Ltd., 1971, pp. 824, 823.

^{3/4} “弥赛亚”为 Messiah 的音译。源于希伯来文，原意为“受膏者”，即上帝的派遣者。犹太国灭亡后，“弥赛亚”成为犹太人期盼的“复国救主”的专称。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基督徒的弥赛亚（救世主）。

⑧ Solomon Grayzel, *A History of the Jews: From the Babylonian Exile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⑤ p. 574.

其实，通过分析宣言文本，我们不难看出，拿破仑所发布的宣言只不过是外交辞令与情感笼络的集合体，从语气上、内容上看，与他同一时期在意大利、埃及等地发布的针对当地人民的宣言并无多大区别。此外，拿破仑对犹太人的态度还源于他的宗教理念，或者说犹太人问题只是他实施其宗教策略的一个个案。拿破仑自称“没有宗教信仰”，因而也就“没有种种虚构的恐怖，没有对未来的恐惧”。¹ 但是，他又强调人是具有宗教感情的，而且能从这种感情中获得极大的安慰。拿破仑一直主张要尊重别人的信仰，正如尊重别人的人身与财产一样。但是，拿破仑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徒，也没有专一的信仰，他的所谓“信仰”，是随着政治需要不断变换的。^④ 综观拿破仑的政治生涯，他一直在成功地利用宗教服务于个人的政治目的，把宗教作为政治、外交与对外征服的筹码。同时，个人性格也决定了拿破仑不会成为习惯势力的盲从者，因而他的内心深处也就不存在欧洲的封建君主那种根深蒂固的反犹思想。

二、拿破仑与“犹太名人会议”

1799年拿破仑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1804年称帝并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早在1802年4月8日，拿破仑曾颁布法令，授予法国公民自由信教的权利，犹太人与其他教派教徒一样拥有平等的宗教信仰自由。1804年，拿破仑颁布《民法典》，明确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四) 登上权力之巅的拿破仑以军人作风来治理国家，“中央政权的法令法规以及其他各种命令必须要以电流般的速度传到全国各地”，“由大革命引发的历时十年之久的以地方自治为特征的‘民众狂欢运动’基本宣告结束，一套由中央到地方均需听命于第一执政的集权体制终于形成”。^{1/4} 在这一体制下，对于任何背离“法国化”的行为与现象，拿破仑都会严肃对待。

一直存在着的阿尔萨斯农民与当地犹太人的矛盾，引起了法国社会的普遍关注。大革命初期，在政府没收和拍卖贵族的地产时，东部阿尔萨斯等省的农民主要依靠向当地犹太人借贷才购得了地产。拿破仑上台后，宣布废除大革命时期发行的纸币，使阿尔萨斯农民受到沉重打击，无力用新的货币偿付犹太债权人，大约4万农民深陷于犹太债权人的债务之中。这导致阿尔萨斯人对犹太人仇恨的迅速上升，在整个地区掀起一场以洗劫犹太人房屋和商店为特征的骚乱。^{1/2}

法国保皇党人敏锐地注意到阿尔萨斯的混乱局势，并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制造不利于犹太人的舆论，说犹太人正在买下整个乡村，压榨当地的法国农民。他们还怀疑犹太人被同化的可能性，称犹太人是“国中之国”，是顽冥不化的特殊群体。保皇党人的哲学家路易·德·博纳尔（Louis Gabriel de Bonald）领导了这场运动，拿破仑的大臣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和另外一些理论家积极加入，法国一家主要新闻报纸也刊登了一篇带有强烈反犹色彩的文章，宣称如果犹太人不改宗为天主教徒的话，就取消他们的法国公民权。博纳尔甚至毫无根据地说：“犹太人财产的四分之三是靠高利贷积累起来的，犹太人是阿尔萨斯的新地主，应该取消犹太人的公民权。”^{1/4} 1806年1月，拿破仑来到斯特拉斯堡的时候，当地的非犹太人向他抱怨了犹太人

¹ 王养冲、陈崇武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5页。

^④ 参见王敏华：《拿破仑与法国天主教的复兴》，《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56页。

^(四) Ben Weider, *Napoleon and the Jews*, http://www.napoleonseries.org/ins/weide/c_jews.html, 2007 6 15.

^{1/4} 陈文海：《法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0页。

^{1/2} Howard Morley Sachar,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 p. 57.

^{1/4} Michael Graetz, *The Jews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1.

的种种“讨厌之处”，包括犹太人死守其传统行业，以及如何盘剥非犹太人等等。“拿破仑带着对犹太人的不良印象离开了斯特拉斯堡，并承诺考虑非犹太人的不满情绪”。¹ 在阿尔萨斯农民强烈请求皇帝采取措施没收犹太人财产的同时，一些法国官员也向拿破仑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被反犹情绪所支配的司法部长甚至决定要对法国犹太人颁布特别法令，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放弃高利贷交易。诸如此类的言论影响了拿破仑，他认为不能再对犹太人占有美丽的阿尔萨斯而无动于衷了，应该采取措施尽快恢复“良好的秩序”。^④

长期以来，拿破仑对高利贷者抱有偏见，希望犹太人能够放弃高利贷业。^(四) 不仅如此，在拿破仑的思想深处，整个商业与金融业都是不可靠的，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所分析的那样：“拿破仑同一切开明专制君主一样，总是非常注意经济的进展；这的确不是因为它能改善人民的处境，并使平民各阶级分享文明的成果，而只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因为发展经济就有希望建立健全财政，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从而使军队获得新的兵源，最后由于减少失业和增产粮食，从而确保‘秩序’。因此，他对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的关注是不平衡的，一心考虑着战争的拿破仑对商业界和金融界是不信任的，因为这两界的活动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并到处同英国有密切联系。同时，拿破仑出身贫寒，始终认为商业和金融资本是循环流动的，不能为国家带来根本财富。他对工业很感兴趣，尤其关注那些消耗本国原料的工业。他认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力量，像斯巴达或罗马这样军事强国的力量，是寓于农业之中的；农业提供好士兵，在必要的时候，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1/4} 这种重农主义的思想根源，使拿破仑在这场阿尔萨斯地区农民与犹太债主的冲突中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农民一方，他甚至把犹太人比作是“民族中的民族”、“盘旋在法国人头上的一大群乌鸦”。^{1/2} 他认为，处理好眼前的争端，不仅可以安抚农民和保皇党人，还能纠正犹太人的一些不良行为方式。当他第一次在国务会议上提出“阿尔萨斯农民所欠犹太债主的债务均可延期偿还”这个建议时，引起了议员的激烈争议。一部分议员狂热地支持皇帝的建议，并要求立即取消犹太人的解放权利；而另外一部分人强调拿破仑皇帝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大革命原则的继承和发扬，况且法国的那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已经被事实证明可以成为良好的法国公民，因此不能取消犹太人的公民权。拿破仑最后还是采取了不利于犹太人的政策，他于1806年5月30日宣布，阿尔萨斯农民欠犹太债权人的债务全部延期一年（而对该地区的基督教高利贷者却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政策），结果使许多阿尔萨斯犹太人倾家荡产。拿破仑的态度使犹太人感到震惊，他们最终意识到，关键时刻皇帝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阿尔萨斯事件平息以后，拿破仑下决心管理犹太人，解决犹太人的“国中之国”问题，使他们真正地融入法国社会。

拿破仑成功地结束了对法国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重组之后，又想以同样的方式把犹太人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目的是确保犹太人毫不含糊地忠诚于法国。为达到这一目的，也为了抬高自己在欧洲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拿破仑于1806年7月推出了“犹太名人会议”。^{3/4}

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拿破仑进行了关于犹太人状况的调查。1806年4月，内政大臣洛泽尔（Lozere）负责此次调查，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各地犹太人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其中多少人占有

¹ ④ H. Graetz,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Hebrew Publishing Company, 1930, pp. 409, 409-410.

(四) Georges Lefebvre, *Napoleon: From Tilsit to Waterloo 1807-1815*, trans. J. E. Ander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86.

^{1/4} 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上卷，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端木正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3页。

^{1/2} Michael Graetz, *The Jew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 31.

^{3/4} 犹太名人会议（The Assembly of Notable）又译为“犹太长老议事会”、“犹太长老会议”等。

土地、大多数人从事什么职业、他们在交易中收取多高的利息、他们是否认真遵守国家法律、他们如何看待服兵役等方面。这些内容构成了后来拿破仑向犹太名人会议所提问题的基础。参加犹太名人会议的成员由各省省长选任，选任的原则是“财富、正直、信誉”，据此选出来的代表多数是富裕并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犹太名人。波尔多犹太人领袖、金融家亚伯拉罕·菲达多 (Abraham Furtado) 被选为犹太名人会议的主席，东部犹太人领袖贝尔·以萨·贝尔也是会议的筹备者之一。¹

1806年7月29日“犹太名人会议”首次会议在亚伯拉罕·菲达多的主持下召开，112位知名人士出席会议，其中有25位拉比及一些商人、银行家代表。起初，一些犹太领袖对“犹太名人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也给予高度评价，但他们很快就改变了看法。拿破仑召集“犹太名人会议”是以阿尔萨斯事件为借口的，他标榜会议的目的是要“唤醒犹太人在漫长的数世纪之久的卑贱堕落的生活中所丧失的公民道德和良知”。^④ 其实，拿破仑的实际意图远不止这一点，首先“犹太名人会议”是作为拿破仑确保其犹太臣民忠诚于他的御用工具；其次，他希望通过这个大会进一步剥夺犹太人，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为了考查犹太人对法国的忠诚程度，开幕式被安排在犹太人神圣的安息日——星期六，而按照犹太律法，犹太人在这一天禁止从事这样的活动。一些代表曾要求改变日期，却被断然拒绝。显然，拿破仑及法国的统治阶层正是想以此来考验犹太人是不是把法兰西国家的意志置于其宗教忠诚之上。^(四) 拿破仑的犹太事务顾问莫莱伯爵 (Louis Mathieu comte Mole) 致开幕词，他发表了冗长的演说，不遗余力地诽谤犹太人，谩骂犹太人放高利贷的行为。他强调说：尽管如此，智慧而友好的皇帝还是愿意给犹太人一个补救的机会，假如犹太人能够证明他们值得被授予公民权的话，皇帝会保留犹太人作为法国公民的全部权利。随后三位帝国高级专员代表皇帝非常“庄严地”向犹太代表提出了以下12个问题：

1. 犹太教律法允许一夫多妻吗？
2. 犹太教允许离婚吗？未经民法批准、而依靠与法国法律相矛盾的犹太律法所宣布的离婚有效吗？
3. 犹太男子或女子能否与基督徒通婚？犹太律法只允许族内通婚吗？
4. 在犹太人的眼里，法国人是其同胞还是陌生人？
5. 在上述情况下，犹太律法对不信仰犹太教的法国人有什么样的行为规定？
6. 在法国出生、被法律认可为法国公民的犹太人是否承认法国是他们的祖国？他们认为有捍卫法国的义务吗？他们是否能够遵循法律以及对民法的一些解释？
7. 谁来任命拉比？
8. 拉比对犹太人拥有什么样的裁判权？行使哪些司法权？
9. 拉比的任命及司法权是根据成文法律来确定，还是根据习惯法来认可？
10. 犹太律法禁止犹太人从事某些职业吗？
11. 犹太律法禁止犹太人对其教友放高利贷吗？
12. 犹太律法是否禁止对非犹太人放高利贷？^{1/4}

¹ 转引自张庆海：《犹太名人会议研究》，《史学集刊》2006年第3期，第35页。

^④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王丽丽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1页。

^(四) David Rudavsky, *Modern Jewish Religious Movements: A History of Emancipation and Adjustment*, New York: Behman House Inc., 1967, p. 85.

^{1/4} 参见 Jay R. Berkovitz, *The Shaping of Jewish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Detroit: Wayne

上述 12 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国犹太人是否把法国视为自己的祖国？是否把法国人视为自己的兄弟？是否把遵守国家的法律视为自己的义务？”¹ 而所有这些问题中，最令犹太人感到屈辱的是皇帝怀疑他们对法国的忠诚。他们不会忘记，在大革命时期，许多犹太人为法兰西而战。在解放的最初年代里，法国犹太人遵循贝尔·以萨·贝尔等领袖人物的教诲，用法语代替了意第绪语，^④ 用革命历法代替了犹太历法，不少人放弃了守安息日，还把子女送进了世俗学校。作为德国启蒙思想家门德尔松的推崇者，贝尔根据门德尔松的德文版本，把《圣经》译成法语，以便让孩子们在学习希伯来语原始版本的同时，也能看到作为母语的法语的解释，从而使宗教学习与法语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贝尔的教育改革计划中还包括建立新式的犹太学校，其宗旨是要把自己的子孙培养成“好犹太人、好法国公民”。^④ 贝尔等人的目的显然是要法国犹太人按照新的环境及现代化的标准来调整自身的生活方式，在自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法兰西民族之间培养出一条新的文化纽带。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他们在革命年代所树立起来的理想过于乐观了，“没有考虑到各种各样很可能会延缓现代化步伐的社会及宗教势力”，这种势力不仅存在于犹太世界的内部，也同时来自令他们感恩戴德的拿破仑将军及法国社会。^{1/4}

不管内心如何委屈，犹太名人代表们还是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令对方满意的回答。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犹太教律法当然不允许一夫多妻制，犹太人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都遵守着一夫一妻制原则。对于犹太人是否愿意法国化、放弃民族性的问题，代表们声称犹太人把法国看做自己的祖国，把法国人当作自己的兄弟。代表们援引了一个历史事例来说明他们对法国的感情：“巴比伦之囚”结束的时候，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允许犹太人返回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第二圣殿，但很多犹太人已经把只生活了 70 年的巴比伦看成了他们的家园而不愿意返回故乡。^{1/2} 法国犹太人自然会把生活了数世纪的法国当作自己的祖国，愿意为保卫法国、保卫拿破仑而战，直到死！他们还表示，愿意成为皇帝所希望的那种好公民。在犹太社区传统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代表们的回答也很令拿破仑满意。他们承认国家法律高于犹太律法，不经民法的批准，犹太律法判决的离婚是无效的。在犹太律法和法国法律相矛盾的时候，“国家的法律高于一切”。拿破仑不仅提出通婚问题，而且将它置于 12 个问题中的显要地位，说明他要削弱犹太民族性，并使之不再成为“民族中的民族”，这是他的主要目的之一。^{1/4} 尽管犹太律法并没有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通婚，也没有规定犹太人只能族内通婚，但由于通婚问题涉及犹太人身份的界定问题，因此引起了与会的一些拉比的怀疑与反对。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关于通婚问题的质疑，承认与基督徒结婚的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③ 针对犹太人放高利贷的问题，代表们解释说，犹太律法所允许的有偿借贷，对犹太人以及非犹太人是平等的，放高利贷不是犹太人所独有的不良商业行为，而是许多人（包括基督徒）共有的商业行为，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在数量上也没有社会上所指责的那么多。总之，犹太名人会议的代表对拿破仑

¹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8.

¹ Michael Graetz, *The Jew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p. 416-417.

④ 意第绪语 (Yiddish Language) 是 10 世纪前后流散时期的犹太人中所形成的一种语言，主要为中欧、东欧以及后来的美国犹太人所运用。意第绪语属于一种混合语言，采用希伯来字母拼写，语法结构由日耳曼方言演变而来，大量吸取了德语、波兰语、俄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以及法语、英语的词汇。

④^{1/4} Jay R. Berkovitz, *The Shaping of Jewish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p. 75, 76.

^{1/2} Dan Cohr Sherbok, *Judaism: History, Belief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244.

^{1/4} 张庆海：《犹太名人会议研究》，《史学集刊》2006年第3期，第36页。

③ 参见 Ellis Rivkin, *Napoleon and the Sanhedrin*,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Jewish Institute of Religion, 1957, p. 12.

的态度是忍气吞声，甚至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犹太名人会议实际上成了犹太人宣誓效忠法国的声明。¹

拿破仑自然十分高兴，并派遣莫莱伯爵向名人代表转达了他的赞赏与满意之情。尽管莫莱本人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但会议的结果也出乎了他的预料。他完全改变了开幕式上的语气与措辞，充满热情地对代表们说：“诸位都是世界上最古老民族后裔的代表，看到你们这一群贤人俊秀聚会于此，谁能不大为感动呢？如果古人能再度复生，亲逢此盛会，他岂不认为自己正置身于圣城之中吗？他岂不认为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事务吗？”^④

三、犹太教公会的恢复与重组

犹太名人会议之后，拿破仑决定通过一个具有宗教权威的机构来实现代表们的“请求”，“批准”犹太名人会议的各项决议。同时，阿尔萨斯事件以来，拿破仑一直想安抚一下犹太人，以赢得他们对法国的永远忠诚。^(四)为此，拿破仑提出恢复古老的“犹太教公会”（Sanhedrin），让犹太人“在法国找到他们的耶路撒冷”。

犹太教公会作为古代犹太社会的最高立法与司法机构，自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毁灭后已经有一千八百多年没有召开过了。犹太教公会将要恢复和召开会议的消息传开之后，许多犹太人认为这是皇帝尊重犹太人历史传统的标志，他们欢呼拿破仑是犹太人的解放者。1807年2月9日，重组“犹太教公会”的会议在巴黎召开。71位成员（一说为70位）中有2/3是拉比，1/3是世俗犹太人。成员来自法兰西帝国的所有行省，其中包括意大利北部地区、整个荷兰地区和德意志的一些地区，主席是来自斯特拉斯堡的拉比大卫·辛茨海姆（David Sinzheim）。犹太教公会批准了犹太名人会议的决议，并承认这些决议具有宗教法律效力。犹太教公会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摩西的律法和拉比的权威一再被强调仅在宗教领域内应用，重申了法国犹太人的政治忠诚，民事裁判权高于宗教裁判权。代表们再次表达了对法国同胞的爱心，他们用最神圣的宗教话语谴责阿尔萨斯的犹太高利贷者。可见，犹太名人会议和犹太教公会的成员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未来同法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了。正如亚伯拉罕·菲达多在一份声明中所说的：“我们不再是‘国中之国’了，法国是我们的祖国。犹太人啊！你们的义务已明确规定了，幸福在等待着你们。”^¼

拿破仑的举措影响了欧洲，不仅给德意志许多公国中的犹太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甚至对当地的一些统治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拿骚（Nassau）公国的统治者听到犹太教公会成功召开的消息后，重启了搁置已久的旨在改善犹太人地位的立法工作。^½对拿破仑的赞美之声还遍及法国和意大利的犹太会堂，甚至东传到沙皇俄国，犹太人甚至把拿破仑比作了曾经允许以色列人返回故土重建“第二圣殿”的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奥地利驻巴黎公使梅特涅·温尼堡（Metternich-Winneburg）在呈给外交大臣的信件中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把拿破仑看做是他们的‘弥赛亚’”，“拿破仑把自己变成了犹太人的救星”。

¹ Jay R. Berkovitz, *The Shaping of Jewish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 78.

④ H. Graetz, *History of the Jews*, p. 419.

(四) Howard Morley Sachar,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 p. 62.

¼ Howard Morley Sachar,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 p. 63.

½ Kober Adol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Jews in Germany,"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7, 1945, p. 320.

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拿破仑每一项决定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动机。犹太教公会的恢复和重组除了进一步得到犹太人的忠诚保证、贿赂犹太领袖人物之外，还有更紧迫的原因。1806年9月，拿破仑军队已经到达了波兰的维斯杜拉（Vistula）河岸，缪拉（Murat）元帅的骑兵和达武（Davoust）元帅的步兵正兵临华沙城下。这支庞大的军队无疑需要给养维持生存，然而俄国人已经破坏或拿走了所有的东西，船只也被凿沉，维斯杜拉河变成不可逾越的天险。拿破仑和欧洲许多君主一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想起了犹太人。当时，波兰居住着大批犹太人，他们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国际联系，能为军队提供谷物、燕麦和大麦。拿破仑相信通过召集犹太教公会，不仅能笼络法国犹太人，而且能争取波兰犹太人的支持。在犹太教公会召开的日子里，拿破仑十分关心波兰犹太人的状况，并通过一些中间渠道同波兰犹太人结为联盟，全面了解波兰犹太人的思想状况。事实证明，拿破仑的策略十分成功，波兰犹太人尽最大努力来表达对拿破仑的感恩之情。许多波兰犹太商贩自愿承担为驻扎在华沙大公国的拿破仑军队提供给养的责任。“在进军波兰的途中，拿破仑感受到了穿着长袍、留着胡子的当地犹太人所给予的巨大支持，他们给拿破仑的军队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据记载，拿破仑曾深有感触地说：‘犹太教公会对我来说至少是有用的。’”¹ 当时在许多波兰犹太人的心目中，拿破仑是一位英雄和解放者，一位亲切而又杰出的传奇者！拿破仑成了讲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人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永久部分。^④

在得到赞美的同时，拿破仑的政策也遭到了反对，反对者既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国外方面，反对最激烈的是俄国的沙皇和东正教会，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宣称拿破仑是基督教上帝的敌人，因为他解放了犹太人；东正教会发表了诋毁拿破仑和犹太教公会的声明，普鲁士的新教徒也强烈反对拿破仑的犹太人政策。国内方面，反对声音包括了法国政坛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拿破仑的政治顾问莫莱伯爵、克勒曼元帅（Marshal Kellermann）以及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等都建议拿破仑不要给予犹太人太多的权利，并且主张限制犹太人自由从事商业的权利。枢机主教约瑟夫·费斯（Joseph Fesh）也忧心忡忡地告诉拿破仑：“你给予犹太人与天主教徒同样的待遇，你难道希望世界毁灭吗？你难道不知道《圣经》曾经预言说当犹太人被承认为一个集体的民族时，也就是世界毁灭发生的时候吗？”^④

由于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和反对，再加上东部阿尔萨斯等省犹太人融入法国社会的步伐依然缓慢，同时许多地方犹太人的地方自治机构仍在发挥作用，这在拿破仑看来，犹太人为“国中之国”的状况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拿破仑决定颁布一系列限制和控制犹太人的法令，以此来减少一些批评和抗议，并促使犹太人尽快融入法国社会，然后再逐渐地废除这些限制性措施。1808年3月，拿破仑提出在摩西宗教的基础上对法国犹太人实行有机管理：“犹太中央会议”和各地的分支机构要加强与当地犹太人的联系，^{1/4} 要对那些重操高利贷业的犹太人进行严厉斥责，要负责为拿破仑招募犹太兵役；各地的拉比要监督犹太人的宗教生活。这些机构表面上看是为了管理犹太人的事务，实际上是控制犹太人的工具，变成了统治犹太人的行政力量和拿破仑的政策代理。拿破仑正是通过这些机构招募犹太士兵，获取经济实惠并控制犹太社团的政

¹ Cecil Rot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London: East and West Library, 1959, p. 345.

④ Howard Morley Sachar,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 pp. 63-64.

④ Franz Kobler, *Napoleon and the Jews*, p. 163.

^{1/4} 早在1802年2月，拿破仑就宣布犹太教在法国为官方认可的宗教，犹太教成为法国官方的第三大宗教，并在巴黎设立了由拉比及世俗代表组成的“犹太中央会议”，在巴黎中央宗教法庭的监督之下审理犹太教事务，并在一些人口超过1000人的犹太社区设立分支机构。

治、经济及文化。1808年7月20日，拿破仑又颁布一个法令，命令犹太人的名字要采用法国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这在犹太人同化于法国的过程中有着深远的意义。¹

拿破仑也加强了对犹太人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管理。1808年3月17日，他颁布法令限制犹太人的经济活动，规定没有得到地方行政长官颁发执照的犹太人，10年之内不得从事商贸、借贷业，而这种每年更新一次的执照仅仅授予那些信誉良好、道德高尚的犹太人；免除、减少或推迟所有欠犹太人的债务；犹太新兵不得代替老兵服兵役，而基督徒则可以付费给志愿者以免除兵役。对犹太人的居住权也作了一些规定，作为一项减少阿尔萨斯犹太人口的措施，禁止那些暂时离开的犹太人返回他们原来的家园。上述法令在犹太历史上以“声名狼藉的法令”（Infamous Decrees）而著称。“犹太名人会议和犹太教公会的代表感受到了对他们的背叛，但却无能为力。1791年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平等的原则被亵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被置于二等公民的地位。”^④“声名狼藉的法令”说明了拿破仑要把犹太人问题严格置于国家的政治框架之内，或许他想以此来继续表明其对犹太人的态度：做法国公民，他们能拥有一切；继续做犹太人，则一无所有。^④该法令遭到犹太人的激烈反对，到1811年，拿破仑在许多地区又逐步取消了这些限制性政策，实际上这些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性政策并没有真正地得到贯彻执行。

如果说，拿破仑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宣言充分体现了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心的话，而“犹太名人会议”与“犹太教公会”的召开，尤其是“声名狼藉的法令”充分体现了拿破仑对犹太人的利用与限制，在这一点上，他和欧洲的历代统治者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很显然，当政以后的拿破仑完全背离了他在巴勒斯坦所许下的解放犹太人、建立犹太国的承诺。作为皇帝的他考虑的是如何协调各个阶级的利益，使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他个人的政治目的，拿破仑犹太政策的核心可以总结为归顺、改造、同化三个步骤。拿破仑对待犹太人的矛盾性政策实际上反映出19世纪欧洲统治者共同面对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期望犹太人融于当地社会，通过消除社会与宗教构成的关键性因素而使犹太人规范化；另一方面，犹太人作为替罪羊仍然是有用的，因为他们能使统治者表明他是站在主体民族而不是犹太人一边。此外，拿破仑对犹太问题的处理也表明，承认犹太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申明的问題，“哪里的传统性的蔑视犹太人的现象继续存在，哪里将犹太人和犹太教视为西方文明中的合法存在而予以承认就不容易实现”。^{1/4}1816年，当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那岛上时，他的私人医生奥·麦拉（O'meara）曾问他为什么实行支持犹太人的政策，拿破仑的回答是：“我解放犹太人，给他们平等的法律地位，让他们享有与天主教、新教一样的宗教信仰自由，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给法国带来更多的财富，同时促使犹太人放弃高利贷，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公民都视作兄弟了。因为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如果看到他们在法国能享受到比其他地区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时，他们会源源不断地涌入法国并为我们服务”。^{1/2}一位对拿破仑抱有政治成见的天才女性斯达尔夫人曾这样评论拿破仑：“不同于其他知名的人物，他既不善良也不强暴，既不温顺也不凶狠……他没恨也没爱，心中只有他自己，其他

¹ Isaac Landman, ed., *The Universal Jewish Encyclopedia*, vol. 4, New York, The Universal Jewish Encyclopedia, Inc., 1941, p. 378.

^④ David Englander, ed., *The Jewish Enigma*,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and Peter Halban, 1992, p. 97.

^④ Max I. Dimont, *The Jews in America: The Roots, History and Destiny of America Jew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p. 73.

^{1/4} 罗伯特·M·塞尔夫：《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524页。

^{1/2} Franz Kobler, *Napoleon and the Jews*, pp. 174-175.

的芸芸众生都是筹码……”¹ 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也确实证明了犹太人问题是他手中的筹码之一。

尽管拿破仑上台后对犹太人采取的摇摆不定的矛盾政策，伤害了一些已经“法国化”的犹太人的情感，但在大多数犹太人看来，“遇到拿破仑是犹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政治家第一次把犹太问题看成是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他试图解决犹太问题的尝试是基于对犹太民族存在的认可。”^④ 也正是在拿破仑的影响之下，“犹太人问题”成为欧洲及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热门话题。1815年召开的影响欧洲政治版图的维也纳会议，专门把“犹太人问题”列为大会讨论的议题。此后，犹太人问题屡屡出现在国际会议的讲坛上。拿破仑对犹太人的政策与态度，对当时和后来的欧洲历史和犹太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拿破仑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给予犹太人平等的政治地位与公民权利。拿破仑的征服战争不但促进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促进了欧洲犹太人的民族觉醒。随着趾高气扬的法国军队开进一个个欧洲城市，隔都的壁垒纷纷塌陷，这促进了欧洲犹太人的解放。不仅如此，拿破仑的军队“终结了旧欧洲社会组织的封建模式，最终为犹太人的政治与经济选择开阔了新的视野”。^④ 拿破仑的出发点是要改变法国犹太人的生存方式，促进其法国化进程，却在客观上打破了犹太人传统的职业限制，大大扩展了犹太人经济活动的领域。在拿破仑时期，欧洲新兴资本主义工业已取得迅速发展，商品经营与流通的节奏明显加快，传统的垄断模式被打破。尤其是在当时的西欧地区，经济已发展到一种无与伦比的程度，几乎成为全世界的“制造车间”，商业、工业及各类自由职业的需求量猛增。在此背景下，刚刚获得公民权及职业许可权的犹太人很快进入多种经济部门，其职业领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开始告别高利贷业、小商贩业和旧衣批发等传统职业，成为了受人尊敬的手工业者、国际贸易商、经纪人、制造批发商和股票交易人等，他们作为企业家、制造商、发明家、银行家而引人注目。

拿破仑召开的犹太名人会议和恢复组建犹太教公会体现了他对法国犹太人的改造政策，这些为以后百余年间西方犹太人的生活定下了基本格调，其后许多犹太人放弃社团自治，逐步融入所在国的社会生活。从结果上看，拿破仑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正如他的一位官员在犹太教公会召开后所说的那样：“犹太人作为民族中止了，仅仅留下了宗教。”^{1/4} 拿破仑失败之后，许多欧洲国家的犹太人仍以法国犹太人为榜样，同化于主流社会，到19世纪50年代前后，大部分欧洲国家也都完成了对本国犹太人的同化过程。犹太人不再是游离于居住国之外的特殊群体，而是变成了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等等。随着岁月的逝去，隔都生活已成为一种遥远的民族经历，永远尘封于犹太人的记忆之中。还应该指出的是，拿破仑的犹太政策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关此点将另文详述。

〔作者张倩红，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河南大学高校人文重点学科研究中心教授。开封 475001；贾延宾，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姚玉民）

¹ 奥克塔夫·奥布里：《拿破仑秘史》，乐祖德、朱延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④ Franz Kobler, *Napoleon and the Jews*, p. 213.

^④ C. Roth and G. Wigoder, eds.,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 12, p. 825.

^{1/4} Zosa Szajkowski, *Jew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s of 1789, 1848 and 1850*,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1970, p. 972.

Chinese diplomacy during the war was able to grasp this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had some immature and imperfect aspects.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and Soviet China Policy

Chen Hui (138)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s in the Yalta system, the US and the USSR sought to prevent the outbreak of a large-scale civil war in China and tried to suppor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ed by Chiang Kai-shek in realizing peace, democracy and unity in China. While Marshall's mediation was under way, civil war seemed inevitable in China, and the Cold War was taking shape in Europe. This made the US draw closer to Chiang Kai-shek, and changed its China policy from one of mediat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to one of supporting Chiang in his attempt to wipe out the Communists by force. The USSR, worrying about once again losing its interests in China, gradually withdrew from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ists and provided conditional support to the Communists. China's political forces thus underwent a reorganization. The USSR's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Chiang Kai-shek went from coordination to opposition, particularly on the question of the Northeast, where the USSR joined the CPC in resisting the US and the Nationalists.

The Assembly of Jewish Notabl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anhedrin: Napoleon's Policies towards the Jews

Zhang Qianhong and Jia Yanbin (155)

Napoleon's policies towards the Jews after he took power were highlighted in the Assembly of Jewish Notabl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anhedrin. He retained and developed the citizenship rights that had been conferred on French Jews during the Revolution. However, while in power he restricted and made use of the Jews. His apparent tolerance failed to completely hide his complex political motives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The ideals of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advocated in the Revolution mingled with self-interested nationalism. Nevertheless, despite these contradictions, Napoleon set the keynote for European Jewry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More and more Jewish people began to give up communal autonomy and gradually merge into the societies in which they lived.

"Aphasia" of Refugee Intellectuals in the US from Nazi Germany

Li Gongzhen (167)

"Aphasia" or lack of speech was a common problem facing Jewish refugee intellectuals who came to the US from Nazi Germany after 1933. German-speaking writers, scientists and artists in exile had different experiences and met with different fates in overcoming language barriers in their careers, reflecting the two dimensions of American culture: assimilation and rejection of foreign cultures.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for the "outsiders" worked as a filter that filtered out all that was not needed or was incompatible with American culture while keeping all that was useful. It provided a vast arena for "outsiders" with the ability and will to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It is through this mechanism of selective adoption and equally selective rejection that American culture keeps enriching itself, keeping its inner core whil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 In this way the US has become the world center of science and culture.